

# 如何形塑创业者

## ——基于后现代主义知识权力观的分析

徐旭英, 高树昱

(浙江大学科教战略发展研究中心, 浙江杭州, 310027;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杭州, 310053)

**[摘要]** 高等教育在创新创业中被期待理应成为发挥核心作用的力量。创业教育改革的提出具有政治战略意义, 创业者培养的问题是我国目前的热点和难点。对高等教育界来说, 要反思教育体系中的目标和方法, 从现代性的批判中获得对教育问题的启发。后现代本身是基于现代而提出的, 打破现代性的知识权力结构下的整齐划一, 满足微观个体的发展多样性。福柯式的后现代知识权力观对创业者培养或创业教育改革有深刻的洞见, 对我们如何更好地形塑创业者富于启示。

**[关键词]** 创业者; 创业教育; 现代性教育; 后现代教育

**[中图分类号]** G7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14)03-0018-05

### 一、我国创业教育的开展及主要问题

所有的人都在接受教育, 教育政策的变动关乎千家万户, 教育也是国家和社会最为关切的具有核心政治意义的问题。2010年颁布的《教育规划纲要》, 便是必须全面推进与深化教育改革这一国家意识与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sup>[1]</sup>。有关教育问题的政治理论而言, 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如何教育公民(谁来教育)和培养什么样的人。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密切程度, 以及作为政治问题的教育在美国甚至是超过经济、就业与犯罪问题<sup>[2]</sup>。在我国应该有越来越多的政治哲学家开始着手来处理教育政治中的那些突出的问题, 如教育的内容、教育的分配以及教育权威的分配等, 我们对此探讨还不深入。毋庸置疑, 教育领域出现的诸多“不正常”或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件以及人们对教育的失望情绪都反映出急需对这些问题加以重视。

如果我们认可现代的自由、民主、平等之类的价值, 我们不仅要考虑的是教育给予人们这些知识和价值观念, 同时还要考虑教育本身是否合乎了民主、平等的诉求, 即教育的手段和方式方法。仅在教育领域内是不可能解决教育问题的, 而要在社会改革的领域内解决问题, 则必须把它视为重大的政治问题来思考。

教育目标随着时代变迁和教育本身形势而改

变。但在国家的明确指导之下,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 国民教育目标体现于几次国家提出的教育战略中, 耳熟能详的创新创业现在愈发作为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整体战略, 尤其高等教育在创新创业中被期待成为发挥核心作用的力量。

关于何谓创业有许多定义, 但最简明的定义为“创办一个企业”, 具有经济属性。在发达国家自主创业大学生占毕业生数的23-25%, 而我们现在平均至多达不到2%。之所以引出创业者的培养这个议题, 也是因为我们国家所提倡的培养创新创业者的教育体系还远远没有成功, “钱学森之问”可以说是成为了本世纪我国面临的课题。在此, 以国民所关注的培养创业者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界)为切入点, 对我国目前面临的教育问题进行一种政治哲学上的思考, 我们何以能够形塑创业者, 现有的教育体系面临的根本缺陷是什么, 改革的矛头应该指向何处, 每个受教育者和教育者应该可以怎么做。

创业教育改革从1999年引入以来, 主要是在高等教育层次上推行, 其历史不算长但是也有十多年。真正进入国家的战略意图要从2007年前后算起, 当年的中共中央十七大报告提出: “完善支持自主创业、自谋职业政策, 加强就业观念教育, 使更多劳动者成为创业者。”而以创业促就业成为了

**[收稿日期]** 2014-03-27; **[修回日期]** 2014-05-19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型大学创业与科学能力集成发展研究”(71273232)成果; 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成果(B13JY01)

**[作者简介]** 徐旭英(1981-), 女, 浙江义乌人, 浙江大学科教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创业教育, 大学发展战略; 高树昱(1972-), 男, 浙江温州人,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副研究员, 浙江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创业教育, 大学发展战略。

每个大学都在喊的口号。到目前为止, 如果借用以下教育改革能否成功的三个条件, 那么每个分析下来都有极大的困难。三个基本条件为: 一是能否促进所有学生的发展, 它涉及教育改革的道德正当性问题; 二是能否对积极支持并参与教育者予以合理的利益回报, 它涉及教育改革的合法性问题; 三是能否采取民主的推进方式, 它涉及教育改革的过程有效性问题<sup>[1]</sup>。创业教育的价值取向还在争议当中, 学生的权益还没有制度性保障, 民主的推进方式更是难觅其踪, 最后教育改革要得到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普遍支持, 更是面临内外的困境。

我国为什么缺乏创业者(是缺乏还是实质上不需要)这是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很容易回答的问题。首先, 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创业的价值取向和判断存在偏见。作为社会创业者, 除了在改革开放下海的那个年代, 很多都是被看作“走投无路”后的选择, 如果有一份较好的工作, 谁也不愿意创业。作为大学生创业, 那更是被看作脸上无光的事情, 是找不到工作才创业。其次, 创业的环境是不可确定的, 这与政策多变性有关, 需要有敢冒风险勇气。随着经济、产业的变化, 偶尔有个别创业英雄成为了人们的榜样, 带动了一些创业模仿者, 但是这都还没有成为教育的应尽之事。环境带来的偶然性使得创业的风险大增。要让创业成为一种像百森商学院那样的生活方式<sup>[3]</sup>, 还需要多年的努力。这些都与人们对“什么是创业, 创业的价值在哪里”的认识有关。

在高等教育机构, 学生的创业活动和学校的创业教育成为了值得批评的对象。有一些另类的创业教育改革, 如让学生直接在大学期间创业。这就带来了许多教育观的冲突<sup>①</sup>, 甚至是社会的大讨论。对于创业者是如何培养的, 就如同当年杜威提出“教育即生活, 学校即社会”<sup>②</sup>一样震撼人心却饱受争议。创业教育需要从自由的、民主的、公民的教育之高度来考量。而不仅是关注在其具体操作层面。这样我们才能对创业者培养的价值观进行澄清。

作为教师习惯于问学生创业需要什么素质和能力, 却不思考学生的基础和类型, 不考虑学生的需要, 这是在以己度人, 即我们通常关心学生所做的事情是否超出教育的规范, 却在本质上并不关心他们个人。创业者要培养什么, 能教给什么内容, 在可能的条件下, 需要反思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价值取向。这不仅是创业教育的疑问, 在职业教育和专业教育问题上, 同样要问培养了什么人, 教育是否有效, 世界银行最新报告我国劳动生产率相比发达国家严重滞后, 甚至落后于拉美印度, 相当于美国 1/12<sup>③</sup>。这点促使我们应该更好地思考整个教育系统。

## 二、目前我国不能成功形塑创业者的主要缘由

(一) 教育的现代性: 反思教育目的和教育方法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清末开始一步步向西方学习, 到今天走了百年历程, 西学东渐在整个教育界仍将继续。现代化是以工业化、技术进步为前提的, 从物质经济领域逐步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吉登斯提出“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 大约在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 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 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 现代性不但注定要全球化, 还意味着与以前的断裂, 而且也使其与其他文化断裂<sup>[4]</sup>。这种断裂延伸到教育上, 反映的是教育传统不断被颠覆? <sup>④</sup>新的观念又还未完全形成与接纳, 人处在无所适从的境地, 传统教育一再受到批判, 但是却没有更好的道路。我们对现代性及其后果显然还不能全面了解, 但是已经有了很多的认识。

理性与现代性有很大的关系, 理性是一个舶来的概念, 它源自科学精神和科学探索的方法, 可追溯到古希腊先贤对于自然事物的研究, 它是基于人与物(自然界)的区别而来。而在中国古代, 讲求天人合一, 所以中国人的传统不追求“(科学)理性”, 不致力于认识物、改造物, 认为人性就是天性, 找到了“人伦”便是认识了世界。这是我们国家不能产生科技的一个非常独特的原因。可以说以理性为根基的教育的现代性使得我国出现了许多“断裂”现象。

教育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学校教育中。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恢复高考以来, 我国家总体教育战略有几次改变, 但学校教育的培养方案和细节的教育制度却没有根本的转变, 更多的是在不断加强学校教育的组织严密性和方法科学性, 以求“高质量”地培养出所需要的人才。

首先, 学校教育目的是为政治经济服务, 自上而下大目标层层分解为若干层次的小目标, 如学校目标、专业目标、学科目标、课程目标甚至是教学单元目标。在不同层级的教育机构中, 基础教育以学生升学为目标, 高等教育倡导就业率目标, 现在国家层面没有改变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指导性目标(可是指导意义已经日渐口号化)。另外,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大学日渐为市场经济和国家主义所主导, 培养人的目标甚至一退再退, 落后于科研与产业化的目标。学校教育的知识内容几经筛选, 如“国学”成了一门非常时髦而无人深谙的“不大有用”的学问, 教育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知识, 更重要的是使人们更加崇尚理性和人的力量, 不再是前现代的“敬天畏神”。

其次, 学校教育体系本身逐渐理性化和科学

化,产生了一整套越来越严密的方法。完善了从幼儿园到老年的教育机构和组织,一套终身学习的理念深入社会人心,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参照西方发达国家的学科门类和专业门类,义务教育制度和国家权威考试将每一个适龄者纳入在筛选机制内,发展了普通教育之外的正规职业教育以及社会培训,学校管理与其他机构一样运用了科学管理原理和科层制(尽管有差别)。班级授课制打破了古老的私塾教育和家庭教育的随意性和零散性,被作为一种从西方引入的最为科学有效率的教学组织方式。考试制度普及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竞争,信息化技术使得教育看起来更公平,减少了作弊与“后门”的可能性。教师的产生同样需要培养和选拔,通过师范学校进行批量生产,现代教育对教师的需求不能依靠自然产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也从以往的行会师徒转向企业的雇佣关系、管理关系,“一对一”变为了“一对多”和“多对一”的叠加;教师的教学不再是一个教学艺术的问题,更重要的教育科学的问题,教师的教学技巧和教学过程可以分解为多个细小的步骤和规定动作加以完成并复制;而这些细节的记录和可观察,为学校教学管理和保证教学的统一提供了可能性。当然,仍然有许多人相信教学是个艺术,要研究教学的智慧,分析教学的实践性知识和个人体验,从现象学角度理解教育问题<sup>[5]</sup>。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制度的力量,认为出现了问题往往是由于“体制”原因(这又导致一种推诿的可能性和无力感、有理由不承担个人的责任),希望从宏大结构上能够一劳永逸地改革。

每个人的受教育权有了保障,同时也成为了义务。“同任何一种前现代体系相比较,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以及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为人类创造了数不胜数的享受安全的和有成就的生活的机会。”这就是教育的现代性带来的光明一面。

可是不能因为有了光明而忽略了必然产生的黑暗之处,甚至黑暗的阴影覆盖面更广。正如韦伯对现代性的论述,他提出了理想型的官僚制度,同时又悲观地认为人类无法逃离自己建造的理性“牢笼”(他指称的是资本主义文明的牢笼)。

现代性的教育特征产生的最大疑惑是同质化。在我国,创新创业与一体化的教育体制有着根本的“个性”矛盾。学校对人的培养犹如企业对产品的批量生产,而那些行为异常者往往就被当成“不合格品”被清理出去。我们发现创业的学生往往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中无法适应,考试不及格、面临退学、被看作性格乖张等,虽然在西方这样的学生很常见,可是对被视作“异数”的学生的宽容程度不同,而且比例和如何成为“异数”也很值得比较分析,

这与东西方的理想人格有关。

(二)现代性对形塑创业者的影响:后现代的知识权力观

### 1. 知识和权力的弥散

不论大学生的创业是要有准备,还是创业活动即是创业的最好准备,这个观点之争与创业类型有关。但是不可否认,创业的学习不是理论性的,必定是实践性的。在教育体制内要开展多变的难以统一的创业实践,面临着与传统知识教育、就业教育、专业教育产生的矛盾。哪个学校开展这项改革,注定要受到从理念到制度、政策和具体细节的百般外部审视,以及内部的教育改革阻力,以福柯的话语来说,在内部的细节上受到知识和权力关系的诸多节制<sup>⑤</sup>。学校作为规训机构,如果不分析这些权力影响的所在,那么大学生创业者的培养是无法落实的。

知识与权力的论题涉及教育的权力控制与利益分配。最主要的是学生权力、师生之间的对话(关系)、教师之间的教育一致性问题、教师权力(涉及学术治理)。关注创业者的培养,主要是要分析学生的权力问题,他们如何获得成长。我们可以用福柯那一套的知识——权力观来展示创业教育改革实施场景内的“斗争的”人事关系(教师与学生,教师之间,上下级管理体系)、制度、环境场域。学校这一规训机构,首先体现在学科、专业、课程要求,这些都有固定的模式,需要属于这一体系的学生加以遵守。创业不分专业,创业者原本应该是通识教育和自由教育的典范,但是在专业内颁发专业文凭就成了一个令教师和管理者苦恼的问题<sup>⑥</sup>。规训的三个很小却很有效的技术是: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检查(考试)<sup>[6]</sup>。尤其通过考试,我们可以发现学生、家长、学校乃至整个社会都能够做到在一个标准下同时性地进行同一件事。

### 2. 创业者=不正常的人

由此,创业者变成了“不正常的人”。正常的学生是按部就班上课交作业的学生,而创业者学生往往学业不佳、专注于各种社会活动而“逃课”,最为关键的是一点是与教师的知识传统相背离。大学生创业者是少数群体,他们可以说是规训的“漏网之鱼”,或者教育筛选机制下的牺牲品,许多创业者学生自愿或被动地退学。

创业者受到的关注变成审查。教师想要让异类的创业者回归课堂,聆听他的教学,秉持其考试标准线不肯放松,教师是掌握知识话语权者,意味着是教育权力的拥有者;学生与教师没有对话;教师之间持不同“政见”对学生要求不一致,导致学生无所适从,教师的自由教育裁量权却造成学生的困扰;教育行政管理追求一体化,即束缚教师也压抑

了学生的个性发展。这些校内微观的知识和权力的对学生的控制一个侧面,而知识和权力连结的规训网络远比此复杂。教育宏观体制对学生的分类分层选拔,由此得以实现。

我们不得不反思,专业教育原则在形成为一套教育标准后,变得“异化”,使得其中的学生没有了发展的自主权,在我国的情况下,经济的快速变革无法使教育跟上步伐,而专业教育下的毕业生大多数就业不对口,而自主创业的学生更是无法从专业中获益。另外,专业教师却唯有因为专业的存在才能获得认可,由此学校为教师和专业服务而不为学生服务,专业不为学生而为学校存在,出现本末导致的怪异现象。在现实的案例中,大学生不喜欢和不适应所选择的专业时毫无办法,高考定终身,而专业却容易“误终生”。

### 3. 师生对话的可能性与难度

当然,教育的理性和现代性也不是绝对的可以控制每一个方面,可以规范教师的教学流程,但比如教师个人魅力的艺术性质更加多过教学技能的科学性质,每个教师的特质构成了其教学影响力。学术领域与经济和政治的领域不同之处在于个人的思想相对自由,而且作为知识分子的教师更愿意作为批判者和思考者而存在。这种理性兼卡里斯玛的性质,决定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对话是人与人的对话,不是知识由高到低的流动灌输,教学艺术需要有教育科学的适度调节。教育科学的性质强调教师的最大任务是教给知识,而事实上远非如此,教育的内涵超越于知识多寡的问题,如果仅仅是教给知识,那么教学就不会那么困难。

创业者培养,也陷入这种对话的艰难中,教师对于创业教育的无能为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教育的现代性在创业教育中不起作用,创业学生的困难和问题,很难表达,创业属经济行为中创新的部分,创新不是单由理性推动的,偶尔的激发(非理性的)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研究创业教育就是试图表达出这种困难并能够解决(不是偶然性地而是常规化地解决)。师生之间的对话,犹如公民的审议和政见的讨论,一对一的对话只能是偶发的艺术,多对多的对话则无人聆听,强调一种少数人的对话,有时需要小组的讨论,这就是“后现代”的主张<sup>⑦</sup>。

创业是学生自行提出问题并尝试解决问题,可是在太过“理性”的大学中,学生缺少问题,与学校不能给予学生自行提出问题的经验有关。班级授课制下,因材施教非常困难,技术上我们采取了选修课和学分制来完善它,选修和学分的目的一方面试图让学生能建立开阔的知识基础,更重要的应是出于对学生自我选择和自我规划能力的认可,让其

选择更加适合的专业技能方向,学到真正想学的东西。这两点难能实现,原因有二,一是选择意味着必有疏漏,二是可选项须极大丰富,几乎不可能满足所有需求。高校教师对一个班的学生进行差异化管理,教师头脑中必定会形成一个学生分类的尺度。这一套分类尺度其实在中小学就已形成,延续至大学并根深蒂固。所以我们发现,大学生仍然愿意跟着教师亦步亦趋,缺乏主动自觉,甚少有自我的疑问与思考,即缺乏创新能力。如是,无对话可言。

### 三、有效形塑创业者的新思路

培养的创业者就是打破现代性的知识权力结构下的整齐划一,满足微观个体的发展多样性。知识和权力问题关乎公平,而公平对于个体学生来说就是人尽其才,有发展和选择的机会。学校之间的差异和学生之间社会背景的差异已经显著导致教育公平性的问题。有调查表明,中国精英大学中城市学生比例远高于农村学生,并且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相应地在草根大学中,经济困难学生的比例就超出了精英大学中经济贫困者的比例。经济贫困和学业贫困(差的学习成绩)联系在一起。富有家庭的学生一般在文化上更训练有素,而贫困的家庭就没有那么多的训练机会,他们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代价<sup>⑧</sup>。在创业教育中,微观层面创业学生能够自主选择发展道路,这或多或少弥补了这种不公平带来的后果。创业活动的特殊之处在于个人的身世背景等外在因素的作用可以被大大削弱,这是有案例验证的,创业活动对个人内在素质的依赖高于外在因素,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平衡这个社会的公平性和流动性。社会正义其实应该是保证这种创业者个人的内在素质能在个人成功道路上起决定性作用,而不是外在因素。目前大多数学校不能推行创业教育,不能培养创业者,也说明其在推动社会公平性上的欠缺。

创业教育如同职业教育一样,在推进教育多样性和社会公平性上具有极高价值。古代教育之人格培养的目的和智慧训练的目的以及技能训练的目的存在根深蒂固的矛盾,今天如果仍然轻视创业与职业教育,那么在教育现代性的强大机制面前,反而会加剧这种分裂——劳心与劳力的分裂,人性与物性的分裂,权力压制性造成的分裂。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矛盾更无从化解<sup>⑨</sup>。本义上,知识和教育理应为人类解放而服务。

很多人认为,大学生在校创业是一种逐利行为,学习期间不应太过强调功利,而应学好知识为未来做好准备。这样的观点的问题在于,首先,教育作为生活的准备早已经被杜威深刻的批判过。而认为能够通过知识学习而为将来的创业做好准备

的想法未免一厢情愿,创业从来不可能是被准备好的,它面对的是无数的未知和挑战,完全充分的准备永无可能。只有在创业的实践过程中才能获得经验,而人类的创新和科学发现无一不是通过“试误”而来。所以什么样的教育观能够形塑创业者,如果我们的教育要为了培养创新创业人才而努力,那么就不能让他们不去亲自尝试。当然创业成功还有很多的要素,我们不能高估大学对个人发展的影响力,大学所能做的是恰如其分的教育。

创业过程的本质是结合了人类获取利益的本能和探求未知的好奇心(这点可能上升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需要),大多数的创业者只能属于较低层次,很少人能够最后成为“伟大的”创业家。我们的创业教育改革现在所要关心的不是培养最顶尖的那些,而是通过它能够打破“同质化”教育的牢笼,满足个性的需求。虽然创业过程中彰显个性和多元性,但也要考虑,创业教育改革是否以反现有的理性和现代性教育的形式,而其实是加强了现代性。创业活动本身是在加剧现代性的,因为它终究追逐利益、追求效益和资本再生。

韦伯所论述的资本主义精神或伦理是理性和现代性的高度呈现,在后现代的视角看这不一定是“好事”。这里所引的后现代的观点,可以用以进一步分析知识和权力在教育领域中的影响,尤其是对现在的创业教育。后现代所关注的是批判现代性的后果,提倡多元化,虽然没有提出人类的光明之路,也没有更佳的对策,不过却能够启发我们思考目前所处的这个教育体系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个人的知识和权力再造,对“不正常的人”的另行判定,提升微观上改变的可能性。将人的自主发展甚至全面发展的人与创业教育相结合,对创业者的培养的价值取向重新定位,以实现更美好的未来。

#### 注释:

- ① 如义乌工商学院的大学生创业案例:大量的学生在校期间从事电子商务等经济活动,其主导教育理念为创业从实践起步,人人都能创业,创业行为不是在具备好理论之后才开始,而是先于理论。
- ② 杜威作为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其教育哲学对传统教育产生了冲击性的影响,核心观点体现在巨著《民主主义与教育》中。他重新重视了劳动者的价值和经验的价值,对什么是重要的知识值得教的知识重新定位,认为教育并非是为生活做准备,对职业教育有了新的认识,某种程度上,启发了创业教育。所以说职业教育与创业教育

是有内在一致性的。

- ③ 定军,袁荃荃.21世纪经济报道.世行报告:中国劳动生产率不及拉美国家[EB/OL]. [2012-05-24]. <http://www.ccstock.cn/finance/hongguanjinji/2012-05-24/A789466.html>
- ④ 这里指不断出新的观点,向已有的和形成中的各种观点进行挑战。有的断裂较深,很难跨越。
- ⑤ 这里主要是考虑到学校和教育相关者受到知识与权力关系的直接影响,福柯对于权力运行机制中的著名例子是监狱,但他同时也将学校定位为了名副其实的规训机构。他的分析对我们理解知识和权力对个人的影响有深刻的启示。
- ⑥ 有一个案例是:一名在校创业学生(在进行创业教育改革的某大学创业园内)经营很成功,临毕业已创办个人公司并雇有员工,但是因为多科不及格,学校苦恼于如何评价该学生,是否应该给予专业文凭的问题。
- ⑦ 关于什么是有效的对话的探讨,参见查尔斯.J.福克斯著楚艳红等译《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 ⑧ 美国的情况见薛涌《精英的阶梯》第57页《世袭精英在美国大学扎根》。
- ⑨ 保罗弗莱雷的《被压迫者教育学》给予我们一些关于压迫的洞见:压迫就是使人在社会的汪洋中失去了自己的意识。压迫不仅是经济利益上的剥夺,更是命名权、“词”权的剥夺,被压迫者没有了批判意识,没有了反思和行动。任何一方客观地剥削另一方或阻碍另一方追求作为可负责任的人的自我肯定,这种情况均属压迫。(顾建新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版)

#### 参考文献:

- [1] 吴康宁.教育改革成功的基础[J].教育研究,2012(1):24-31.
- [2] 杨伟清译,艾米·古特曼著.民主教育[M].上海:译林出版社,2010:1-4.
- [3] 梅伟惠.美国百森商学院的创业教育哲学[J].北京:高等农业教育,2009(2):92-95.
- [4]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上海:译林出版社,2010:1-4.
- [5] 马克斯·范梅南.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 [6]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7.

[编辑:汪晓]